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国际局势

朱 锋

内容摘要：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还在不断扩散和深化，世界主要经济体陷入经济低迷的境地，金融危机很可能引发新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和安全危机。但是，这场金融危机并不会像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那样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单极霸权依然稳定，大国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和政治关系的相对成熟为合作解决危机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新政府在进行海外干预时更加具有选择性，其对外关系在理念、方式和战略重点上都会出现明显变化。应对金融危机重在全球协作，但关键还是增强国家层面的“良治”。

关键词：金融危机 世界局势 美国外交调整

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到2009年正在不断扩散和深化。这是自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以来75年间人类发生的又一次重大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究竟将对整个世界局势带来何种影响，未来的国际战略格局将会因此而发生哪些变化？显然，这些都是对中国崛起进程有显著影响，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一、金融危机的深化：“谷底”在哪里

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不断深化，世界经济局势持续低迷。金融危机究竟将给世界经济带来何种损失与打击，目前各种看法尚存分歧。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2009年1月，美国新增失业人口59.8万人，这是自1974年以来的最大单月失业人口数量，也

朱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使得美国的失业率从2008年12月的7.2%上升到2009年1月的7.6%，另有780万人处于半就业状态。[1] 美国2009年2月又新增失业人口62万，失业率上升到了8.2%。美国的消费支出在2008年第四季度下降4.3%，耐用消费品的销售下降了22.1%，这是自198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跌幅。2008年美国全年经济增长率为1.1%，大大低于2008年2月布什总统2.7%的预期。据白宫方面估计，2009年全年美国经济将出现1.9%的缩水，但这一数字相对其他方面的预测实在是过分乐观，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低迷。[2]

不仅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欧洲、亚洲和南美的经济状况同样萧条。日本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总量下降3.2%，这是自1974年石油危机以来日本经济最剧烈的下滑。2008年日本全年经济增长缩水12.1%。[3] 2009年1月日本已经出现了连续两个月工业生产指数下降10%的状况。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的低迷对全球经济具有很强的指标意义，大量消失的销售订单正在迫使日本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裁员、冻结工资以及削减员工收入。除日本之外，德国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下降了2.1%，全年下降1.7%；德国的失业率则在2009年2月上升到了8.5%，比1月份增加了两个百分点。德国制造业的下滑更为明显，2009年1月的国外订单同比下降了48.2%。[4] 法国的工业产值在2009年1月同比下降了13.8%；意大利经济则从2008年第三季度就开始进入衰退，全年经济下降1%。[5] 2008年第四季度，整个欧元区经济年终下降5.9%。[6] 俄罗斯股市自2008年5月以来缩水了70%，卢布贬值了34%。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3月8日当选总统一周年发表演讲，承认俄罗斯经济在危机中受到重创。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急速下滑殃及世界贸易和全球物流的发展。截至2009年2月中旬，反映全球金属、煤炭、谷物和其他资源船运业务的BDI（Baltic Dry Index）指数自2008年年中以来已经下降了90%。[7] BDI是一个设立在伦敦，已经有265年历史的综合价格分析指数。目前美元的坚挺有利于美国金融局势的好转，但却让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延续。向美国回流的大量国际资金加重了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困难。[8] 在资金短缺、市场消费低迷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09年1月世

1 Howard Schneider, “Unemployment Rate Hits 7.6 Percent in January,”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6, 2009.

2 Alan Rappeport, “US Faces Worst Downturn in Postwar History,”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7, 2009.

3 Reuters, “Japan Confirms Sharp Drop in GDP,” *Financial Times*, March 12, 2009.

4 Ralph Atkins, “German Manufacturing in Freefall,” *Financial Times*, March 11, 2009.

5 施海：“东西欧经济全线疲软、欧元跌势远未结束”，《每日经济新闻》，2009年3月6日。

6 “Euro-Zone Economy Registers a Grim Performanc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4, 2009.

7 Frank Ahrens, “Down Only 27%? We'll Take it,”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6, 2009.

8 Peter S. Goodman, “A Rising Dollar Lifts the U.S. but Adds to the Crisis Abroad,”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09.

界贸易额同比下降了31%。[1]

东欧地区的金融和经济局势更为严重。13个曾是前苏联帝国一部分的国家累积了1万亿美元的外债，东欧地区的外债总额高达1.7万亿美元。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以往每年的外债数量都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在资金信用松动的时候，大量外资的流入能够维持借贷与还款的大致平衡，但却已经积累了大量泡沫。全球金融危机来临之后，外资的流入突然终止，资金开始反向抽逃，东欧地区的债务总额甚至超过了GDP的总值。情况最为严重的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匈牙利的当地货币已经基本崩溃。拉脱维亚外债更是飙升1558%，东欧债务的主要来源是意大利和奥地利。奥地利银行给东欧国家的借贷总额相当于自身国民生产总值的70%。[2] 东欧经济与金融的恶化又反过来拖累了这两个国家。意大利和奥地利都无力救济自己的银行。西欧银行4.9万亿美元未偿还贷款中，近75%贷给了东欧那些已经出现严重经济衰退的国家。[3] 如果东欧国家无法迅速恢复经济，拖欠外债的结果将是进一步打击西欧经济。虽然奥巴马政府呼吁欧盟采取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并帮助东欧解决债务问题，但2009年3月8日举行的欧盟财长会议不愿意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4] 欧盟担心预算出现巨额赤字而犹豫不决的态度与奥巴马政府大举财政透支以增加经济刺激力度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样的形势下，世界银行2009年3月8日公布的世界经济预测数字是，2009年全球经济将增长0.5%。这是60年来世界经济涨幅的最低值。[5] 持续的全球经济不景气正在给不同地区带来深刻而剧烈的不同影响。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反对势力开始示威，东欧地区出现了199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抗议，巴基斯坦局势也是日益动荡。金融危机是否会引发新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以及安全危机，还需要继续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全球局势正在变得日益复杂。

金融危机是否会引发新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以及安全危机，还需要继续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全球局势正在变得日益复杂。

二、金融危机的影响分析：结构变量与国内变量的关联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管如何演变，其结果也难以像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那样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29年至1933年世界大萧条之

1 Alan Beattie, "Explanation for Trade Plunge Proves Elusive," *Financial Times*, March 8, 2009.

2 Liaquat Ahamed, "Subprime Europe," *New York Times*, March 8, 2009.

3 时晔，"拉脱维亚外债升1558%、西欧银行75%贷给衰退东欧"，《理财周报》，2009年3月9日。

4 Tony Barber, "Atlantic Stimulus Rift Grows," *Financial Times*, March 10, 2009.

5 Edmund L. Andrews, "World Bank Says Global Economy Will Shrink in 2009," *New York Times*, March 8, 2009.

所以有如此灾难性的后果，是因为它激化了各大国之间的恶性竞争、瓦解了自由主义贸易的国际规则、助长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冒险主义。这一系列因素既是国际系统层次上的，也是国内层次上的。

第一，大危机来临之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受到沉重打击。西方主要国家的工业生产指数显示，美国在危机最严重的1932年比1929年下降了52.7%，德国下降了53.3%，英国下降了83.5%。[1] 同时，金本位制的国际汇率体系崩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没有固定、可靠的汇率结算制度，整个国际贸易陷入了“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的境地。西方列强纷纷依托自己的殖民地和海外领地，形成了排他性的法郎区、英镑区和美元区。全球经济恶性竞争，使得以非经济手段来抢占和掠夺国际市场和资源的国家意志大大上升。各国争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互排斥、只顾及本国利益的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当这种恶性竞争无法通过外交和政治的手段得以解决的时候，以非经济的政治与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疯狂欲望不断滋生，对世界金融贸易秩序的不满转变成了不惜通过暴力打破旧国际秩序的可怕迷梦。[2] 因此，大萧条来临后原有世界贸易秩序的崩溃促成了各大国之间恶性的权力竞争。

1929年至1933年世界大萧条之所以有如此灾难性的后果，是因为它激化了各大国之间的恶性竞争、瓦解了自由主义贸易的国际规则、助长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冒险主义。

第二，大危机及其引起的国内社会动荡和国际局势恶化，大大助长了极端意识形态的发展和蔓延，令新的民族仇恨和大国对立大行其道，推动了国际关系中狂热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潮的急速膨胀，进一步导致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等问题上的深刻对立和矛盾。例如，法西斯德国“生存空间”理论和雅利安人种族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这些后来被证明为最具侵略性的极端思想就是在大危机的背景下走向了高潮。这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对当时“修约派”的军事冒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加剧了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对“一战”后凡尔塞—华盛顿秩序的仇恨。[3] 当时与英、法、美等“现状国家”相比，德、意、日还处于一种弱国的位置，虽然它们一直试图改变这种

1 J. M. Roberts, *The Penguin His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Peguin Books, 1999, p. 342.

2 有关排他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容易产生暴力冲突的理论分析，请参见：John Hutchinson &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tephen Van Evera, "Hypothes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4 (Spring 1994), pp. 5-39; Barry R. Posen, "Nationalism, the Mass Army, and Military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Fall 1993), pp. 80-124。

3 有关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如何在“二战”前成为引起世界大战根源的理论与案例分析，请参见：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地位，以武力重建国际新秩序，但未必有足够的战争动员能力和战争准备。[1]在国际安全理论研究领域中，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次国际经济危机及其后果的案例分析，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战争理论分支——“机会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ies）理论。[2]1929年至1933年的大危机所激化的极端意识形态直接导致了军事冒险主义的全面上升，打开了战争的“机会之窗”，当时比较弱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看到了运用军事冒险去获得利益和改变现状的“机会”。

1929年至1933年的大危机所激化的极端意识形态直接导致了军事冒险主义的全面上升，打开了战争的“机会之窗”，当时比较弱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看到了运用军事冒险去获得利益和改变现状的“机会”。

第三，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极端意识形态兴起分化了西方世界，美、英、法等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受到国内经济低迷、社会动荡和政府更替频繁等问题的的冲击，缺乏连贯、坚定的政策来维护国际秩序。自由资本主义的相对衰落，进一步助长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泛滥。脆弱的英、法和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美国最终采取了不负责任的“缓靖主义”，对于法西斯和军国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姑息养奸、推卸责任，从而进一步助长了德、意、日的军事冒险倾向，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进程急剧加速了。

第四，国际权力结构中脆弱的多极均势。当时的国际社会中没有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也没有可以对个体国家侵略行为做出实质性集体制裁，具有真正强制力的国际制度。大国之间实力分配相对较接近，很难在国际关系的危急时刻形成一个协调的中心。[3]当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衰弱，英、法采取推卸责任的态度时，没有其他的国际干预力量可以缓和日益紧张的大国间矛盾。结果是，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直接推升了大国间的恶性竞争，无论是当时的国联还是美、英、法等西方大国都缺乏足够的意志和决心阻止侵略，以德、意、日为代表的“修约派”国家最终通过大规模的战争行动造成了对国际秩序的颠覆性打击。[4]

---

1 英、法、美三国在大萧条时代为了稳定国内政局和保证政府经济开支，都大规模压缩军费。Chris Cook and John Stevenson, *European History since 1763*,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155-156。

2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有关“一战”和“二战”之间脆弱的多极化国际权力结构对“二战”爆发的作用，请参见：Margaret MacMillam,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Gordon Wright & Arthur Meijia, jr., eds., *An Age of Controversy: Discussion Problems in 20th Century European History*,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974, pp. 205-284。

4 “二战”以前多极体系的脆弱性之一是没有一个绝对大国有足够的军事实力维持对挑战国的军事威慑能力，英国对德国军事威慑政策的失败成为了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的重要原因。参见：Jeffrey L. Hughes, “The Orgins of World War II in Europe: British Deterrence Failure and German Expansionism,” in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r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81-322。

如果将1929年至1933年大危机导致世界大战的上述这四大因素与当代国际关系相比照，就不难发现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尽管还在恶化，但并不会给国际秩序与世界政治带来颠覆性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进步很可能促成新的大国合作，而不是大国之间的恶性竞争。在一个全球化的各国利益高度相互依存的时代，唯有加强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控制排他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才是世界能走出此次金融海啸的唯一途径。笔者基于以下几点理由做出上述评析。

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尽管还在恶化，但并不会给国际秩序与世界政治带来颠覆性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进步很可能促成新的大国合作，而不是大国之间的恶性竞争。

第一，美国的单极霸权仍然是稳定的。在这样一个金融动荡的年代，任何比美国弱的国家几乎没有可能得到运用军事冒险主义来争夺利益和改变国际现状的“机会之窗”。从国际关系的权力结构来看，此次危机发生于单极体系内，美国的实体经济依然稳定，这对整体国际关系的稳定具有很大意义。

第二，存在于全球市场经济背后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价值、理念并未受到根本冲击。现在西方国家也谈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习经济干预，但这只是1933年后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延续，并不表明现在的金融危机会滋生和推动与现今自由资本主义的理念完全对立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或者极端思潮的出现。当全球危机到来的时候，全球的主流思想和价值依然是自由主义的。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但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仍然存在，控制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将是全球金融与经济合作的重要目标。各国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遭遇了普遍的经济困难，例如市场萎缩、出口疲软、失业率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放慢等等，但贸易保护主义只能为经济与金融困难雪上加霜。2008年11月，第一次G20会议首脑宣言明确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列为各国主要责任。在2009年即将举行新一轮G20首脑峰会的前夕，英国首相布朗敦促美国率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只会使欧洲“沉沦”。[1]

第四，大国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和政治关系的相对成熟为合作解决危机提供了可能性。当前世界政治建立在经济、投资和贸易领域高度相互依赖的基础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相互之间也是最为密切的贸易伙伴，这一事实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国家追求权力的传统模式。当美国和欧洲出现金融危机时，中国、日本和俄罗斯都无法幸免。[2]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G20金融峰会，中国

1 Editorial, "Protectionism Could Sink the EU,"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2, 2009; Wolfgang Munchau, "Narrow-minded Leadership Hurts Europ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5, 2009; George Parker, "US Urged to take Lead against Recession," *Financial Times*, March 4, 2009.

2 从理论上来说，相互依赖产生了更多可以替换冲突，甚至战争的“好处”，而使得国家间的冲突得以管理。参见：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pp. 5-14。

对美国国债高达5850亿美元的持有量（截至2008年11月）、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的事实，都充分说明了各主要国家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相互依赖所形成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为各国共渡金融危机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真正帮助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和新的繁荣。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009年2月访问中国时特意向中国领导人强调，美中两国“正行驶在正确的方向上”，两国应该“合舟共济”。[1]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外交与防务战略的新挑战

2009年1月20日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能否带领美国走出目前似乎还在恶化的国内金融和经济困境，不仅是民主党新政府在内政和外交上压倒一切的“首要关注”，也成为考验奥巴马执政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标。这一背景是分析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钥匙”。应对金融危机成为美国“首要关注”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的恶化还在进一步延续。美国2008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数字自2009年1月以来已经三度下调，最新数字是该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为-6.2%，这是自1982年以来美国经济最大规模的缩水。[2] 整个二月份道琼斯指数下降了119.15点，降幅为12%，创了美国76年以来2月道指的最低值，也是1997年5月1日以来12年间道指的最低值。3月4日，美国GE公司宣布破产保护。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经济在这一波金融危机打击下的“下滑”态势还没有“到头”。根据美国高盛公司的预测，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的经济仍将是负增长，幅度为-4.5%。[3] 这迫使奥巴马政府一切朝着缓解金融危机“看齐”。

其次，奥巴马政府虽然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效果有限。奥巴马政府新的经济刺激方案出台的次日，纽约股票市场就跌到新低。奥巴马上台后虽然只有二个月不到的时间，但经济刺激和金融救助计划已然产生了“政府与社会”的博弈。奥巴马上台后的6周内，美国道琼斯股票指数狂泻了2500多点。目前，围绕着金融和经济振兴与发展方案的争论，不仅激化了美国两党之间的斗争，而且也让不少自由派人士怀疑奥巴马政府治国的基本方针，有人甚至指责奥巴马奉行的是一套极左的经济理念，是对“美国财富的最大破坏者”。[4] 自从国会在2009年2月9日通过总额为79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来，在野的共和党已是火力全开，利用各种场合发起对奥巴马经济与对外政策的严厉批评。共和党

1 “Hillary Clinton Highlights Asia, China in First Major Speech,” Xinhua News Agency, February 14, 2009.

2 Alan Beattie, “US Economy Contracts 6.2%” ,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7, 2009.

3 Kelly Evans and Phil Izzo, “Economists’ U.S. Outlook Dim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3, 2009.

4 Clive Crook, “Why Obama’s Left Leaning Is No Tactical Feint,” *Financial Times*, March 8, 2009.

正在抓住目前美国的经济窘境和经济对策的争议性，力图大力提升自己在美国公众中的地位，扭转2008年11月大选失利的被动局面。如何应对经济与金融局势，无论是树立新政府的威望和新总统的个人形象，还是提振美国经济的信心，都已成为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最紧迫的国内与国际议题。

从目前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将对美国新政府的外交与防务战略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深刻冲击。

首先，美国的全球和地区干预政策将更有选择性，在应对美国面临的各种热点问题时，奥巴马政府将根据其迫切性和重要性的定位来选择解决方式。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进入新一轮“战略收缩期”。相反，由于担心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出现新的地区性动荡，失败国家或者国内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崩溃引发新的国际不稳定因素，美国的全球安全应对能力不仅不会“收缩”，同时还会鼓励其盟国、伙伴参与在美国所选择的重点地区进行重点的秩序维护和重建。因此，金融危机尽管冲击美国的国际干预能力，但对美国的海外战略不会迅速造成“收缩”性影响，特别是美国对热点地区的“重点盯防”不会减弱，还会进一步加强对地区安全局势消极动向的预防。为此，奥巴马在3月2日宣布了从伊拉克撤军的时间表，计划在2010年8月底之前，将驻伊美军数量从现在的14.2万降低到5万，而且驻伊美军在2010年8月之后不再执行战斗任务。奥巴马在竞选期间曾表示上任之后在16个月内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也强调提出一个“负责任的撤军计划”。现在来看，新公布的撤军时间表是最谨慎的伊拉克撤军方案。

如何应对经济与金融局势，无论是树立新政府的威望和新总统的个人形象，还是提振美国经济的信心，都已成为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最紧迫的国内与国际议题。

由于担心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出现新的地区性动荡，失败国家或者国内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崩溃引发新的国际不稳定因素，美国的全球安全应对能力不仅不会“收缩”，同时还会鼓励其盟国、伙伴参与在美国所选择的重点地区进行重点的秩序维护和重建。

奥巴马政府之所以进行选择性海外干预，其原因除了应对金融危机这一压倒性的议题之外，美国政府目前面临的巨额赤字和受限的财政能力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奥巴马政府最近出台了2010年3.6万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很可能造成1.75万亿美元的联邦财政赤字，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12.3%。[1] 这是自1942年以来美国最大数额的财政赤字。

其次，金融危机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美国的全球人权与民主攻势，而将更多的战略侧重点放在促进地区局势的稳定和发展，以防止受到金融危机打击的地区和国家出现“倒塌”风险之后，极端主义、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进一步蔓延。2009年2月7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慕尼黑全球防卫会议上强调，“发展和民

1 Michael J. Boskin, "Obama's Radicalism Is Killing the Dow,"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6, 2009.

主”是美国实现外交与安全目标的最有力的两种政策工具。[1]

奥巴马总统的前任布什总统在“9·11”事件之后推行“布什主义”，其核心就是依仗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按照新保守主义的战略理念，不惜通过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国家重建”来强力推行人权、民主等价值观念。[2] 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还深不见底的局面下，奥巴马政府推行“巧实力（Smart Power）”外交，简单来说就是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根据美国的利益目标和政策需要，让国际社会在防范和应对“失败国家”、“流氓国家”和“问题国家”的进程中和美国分担责任。为此，奥巴马政府下决心稳定和改善美俄关系，重启美俄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这是美国稳定中亚、东欧和外高加索地区局势的必要做法。由于盲目急促的金融自由化，不少东欧国家在这一波全球金融危机下正面临着国家破产的沉重压力。像拉脱维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的银行系统被西欧国家大量兼并和控股，在金融危机重击之下面临着破产的巨大风险。迄今，欧盟对如何拯救这些国家的金融和经济束手无策。美国当然不希望美俄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让东欧的地区性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尖锐化。2009年3月6日，在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谈之后，希拉里国务卿提出，美俄关系已有了一个“崭新起点”。[3]

奥巴马政府推行“巧实力（Smart Power）”外交，简单来说就是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根据美国的利益目标和政策需要，让国际社会在防范和应对“失败国家”、“流氓国家”和“问题国家”的进程中和美国分担责任。

再次，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奥巴马政府的对外关系在理念、方式和战略重点上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从理念上来说，奥巴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主党主流在国际事务上的观点，即重回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自由国际主义”路线。这一路线的核心是美国不能依仗自己的超强实力“包打天下”，而必须在对外行动中注意国际反应和重在建设国际合作。在策略和方式上，美国将改变以往的强硬立场，愿意同伊朗、叙利亚等国进行直接谈判。此外，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点包括：（一）通过敦促各国推出和落实经济刺激方案来稳定全球金融和经济局势；（二）通过增强G20机制来协调各国政策，争取能够控制贸易保护主义和增进国际经济与金融合作，避免金融危机激发新的地区动荡；（三）按照已经公布的时间表来完成在伊拉克的撤军和军事角色的转换；（四）稳定阿富汗局势、避免巴基斯坦崩溃和南亚局势恶化；（五）在伊朗和中东问题上推行“对话”与“和解”

1 Joe Biden's Remarks at Munich Global Defense Conference, February 7 of 2009, *The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9, 2009.

2 对“布什主义”的经典分析，请参见：Jonathan Monten, "The Roots of the Bush Doctrine: Power,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in U.S.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4 (Spring 2005), pp. 112-156。

3 Jay Solomon and Marc Champion, "Diplomacy Reset Worries Some U.S. All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7, 2009.

为基调的新政策。这不仅能为伊拉克撤军创造良好条件，也可以避免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保持世界主要石油供应区的稳定。2009年3月5日，奥巴马政府宣布向巴勒斯坦过渡政府和巴勒斯坦人民提供9亿美元的捐款。这是美国历史上向巴勒斯坦所做出的最大数额的单笔援助计划。2009年3月初，美国派出两位特使前往叙利亚进行访问。2005年因为黎巴嫩总理哈利利被刺杀，美国关闭了驻大马士革大使馆。4年之后的今天，奥巴马政府重新向叙利亚伸出和解之手。与此同时，美国将阿富汗问题与巴基斯坦局势联系起来，在宣布向阿富汗增兵的同时大力加强对巴基斯坦问题的重视和投入。这是美国自“反恐东移”之后又一个重大的战略关注点。依据拜登副总统2009年2月7日在慕尼黑全球防卫大会上的讲话，“发展”成为解决极端主义的重点，那么，避免阿富汗局势恶化、阻止巴基斯坦蜕变成为“失败国家”已成为美国迫切的战略关注。

四、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世界：考验人类的团结与勇气

从中短期来看，金融危机将难以对国际权力结构和财富分配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美国虽然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其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实质伤害，美国的霸权地位依然稳定，美国开始衰落的假设并不成立，国际秩序的基本面是稳定的。在国际权力结构稳定、大国关系发展的可预期性明显以及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机制有望增强的大局之下，国际不安全因素的重点已经转向如何防止和应对国内因素诱发的剧烈冲突。

在国际权力结构稳定、大国关系发展的可预期性明显以及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机制有望增强的大局之下，国际不安全因素的重点已经转向如何防止和应对国内因素诱发的剧烈冲突。

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保持世界经济与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保持全球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理性发展。如果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加深世界范围内的价值与观念冲突，引发新的极端主义的政治意识与社会心理的畸形发展，全球的意识形态冲突将可能死灰复燃。从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教训来看，这无疑是有可能颠覆国际秩序的重要变量。当前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各种问题不可能只停留在经济层面。金融救市和经济刺激方案必然会带来新的利益分配和社会冲突。例如，从2008年4月开始，美国的金融救市计划为其银行系统注资2500亿美元，有人批评美国政府在拿纳税人的钱挽救那些平时漠视民生、热衷于官商勾结的少数金融精英。华尔街金融公司CEO的收入与员工平均工资的差异从1965年的24倍，扩大到了2007年的275倍。[1]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不久，便严词谴责华尔街高层的高薪制度，要求受政府资金救助的金融企业实行限薪，这一表态

1 Harold Meyerson, “Capitalist Punishment,”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6, 2009.

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平衡美国普通民众的不满。

与此同时，加强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建设和体制调整，将会是今后全球范围内的重要趋势。金融危机是全球问题，应对金融危机需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并更加合理地发展贸易与金融领域内的国际治理（global governance）。但是，解决金融危机的关键，就眼前来说并非如何加大国际金融治理的力度，而是如何在国家层次上强化国内治理（national governance）以及协调各国应对危机的措施。根据全国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民商事案件总体上升了15%左右，案件总数550万件左右，涉及诉讼标的额8000亿元左右。诉讼案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也是预测经济走向的“风向标”。自2008年上半年开始，一些东部沿海地区法院受理的借款、担保等金融纠纷案件数量开始上升。由于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的民商事纠纷增多，由于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更是大幅上升。这说明经济环境已经发生变化，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显现，也表明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处于一个高发期。[1]

解决金融危机的关键，就眼前来说并非如何加大国际金融治理的力度，而是如何在国家层次上强化国内治理以及协调各国应对危机的措施。

在这一基础上，世界应该理性和及时地思考人类的发展模式，调整以往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以民主原教旨主义（democracy fundamentalism）为取向的单一发展观。西方成熟的民主政体和社会经济结构显示了在抗击金融海啸冲击时制度的稳定性和成熟度。但一味以西方模式为标杆、不顾自身传统和社会特点而盲目追求的民主化和高开放度，只能使自身受到各种难以约束的市场力量的左右，最终导致国家实体经济的损害和民众福祉的削弱。东欧国家在金融风暴面前摇摇欲坠的经济状况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今天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世界生态，充分说明了“北京共识”的生命力，发展市场经济和谋求民生福祉必然有多种选择和不同道路。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证明，福山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end of the history）”并非现实，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力量和盲目迷失的民主诉求，只会导致像全球金融危机这般的“世界的终结（end of the world）”。[2]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证明，福山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并非现实，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力量和盲目迷失的民主诉求，只会导致像全球金融危机这般的“世界的终结”。

1 “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黄松有违纪案绝非偶然”，《北京晚报》2009年3月11日。文章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9-03-11/131015292703s.shtml。

2 David M. Smick, *The World Is Curved: Hidden Dangers to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9, pp. 9-35.